

〔明〕江盈科 纂 黄仁生 辑校

江盈科集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江盈科 纂
黄仁生 辑校

江盈科集

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岳麓书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章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 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前言

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渌萝，明湖广桃源县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长洲县令，历大理寺正、户部员外郎，卒于四川提学副使任上。著有《雪涛阁集》、《雪涛阁四小书》、《皇明十六种小传》等。一生以文学名世，为公安派代表作家和创始人之一。

关于江盈科的文学思想与创作成就，及其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和地位，笔者曾在《江盈科集》初版《前言》中做过详细论述；最近，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和原有文献，又撰《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一文，对其生平事迹和著述版本存佚情形做了较以往更为深入的探讨。鉴于二文皆已收入本书附录中，本前言拟着重考察从晚明到当代对江盈科的接受与批评。

江盈科生前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首次对他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进之才高识远，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者。……进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远，其为一代才人无论。诗穷新极变，物无遁情。”但其中也透露出时人的批评——即江诗中“或有一二语近平、近俚、近俳”。然后为之辩护说：“此进之矫枉之作，以为不如是，不足矫浮泛之敝，而阔时人之目故也。”并引古代近平、近俚、近俳之作亦传于世的例证，肯定“进之诗，其为大家无疑矣”。稍后，钟惺在《与王稚恭兄弟》中则明确诋斥江盈

科：“其诗定是恶道，不堪再读，从此传响逐臭，方当误人不己。”而其质是否定以“袁、江二公”为代表的公安派诗风：“国朝诗无真初、盛者，而有真中、晚，真中、晚实胜假初、盛，然不可多得。若今日要学江令一派诗，便是假中、晚，假宋、元，假陈公甫、庄孔旸耳。学袁、江二公，与学济南诸君子何异？恐学袁、江二公，其弊反有甚于学济南诸君子也。眼见今日牛鬼蛇神，打油定铰，遍满世界，何待异日？”（《隐秀轩集》卷二十八）虽近乎以骂詈代批评，但这从反面确认了江盈科在公安派创立时期就与袁宏道齐名并称，是仅次于袁宏道的代表作家。

2

江盈科逝世后，他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曾进一步得以确认。袁宏道《哭江进之》仍以“进之才俊逸爽朗、务为新切”而肯定其为“大家”，并以“江阔无澄浪，林深有赘枝”的诗句形象地比拟其功过，但已明确指出那些“为薄俗所检点者”——即近平、近俚、近俳——属“矫枉之过”，并且承认自己有与进之同样的病症。袁中道《江进之传》对其总体评价是：“诗多信心为之，或伤率意，至其佳处，清新绝伦。文尤圆妙。”并认为“进之诗可爱可惊之语甚多，中有近于俚语者，无损也。稍为汰之，精光出矣”。钱希言《明四川提学金事进之江公墓志铭》则谓其早年也受过复古文风的影响，曾“欲以古文辞崛起沅湘间，落笔数千言，烂熳淋漓，若云出岫，泉下峡”，后来才“自辟堂奥，弗袭步趋，虽思若不经，而语多秀出”。具体地说，“诗则俊逸清新，靡所不有”，“其他笺牍奏记题赞诸文，尤工剪裁，翠色欲滴，无烦授吏，对答如流。”但也提及有人诋讥江诗乃“浅之乎成言也者”。

由是可知，江盈科生前和逝世不久后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他的诗歌，而对其散文的评价，则基本上一致肯定。因此，在明末清初，进之散文和杂著尚受重视。例如，潘之恒于万历三十八年曾

将《雪涛阁集》卷十四所录52篇“小说”（实即小品文）抽出来，改题为《雪涛小说》刻以单行，并认为其“为国尽瘁”、“为人尽力”、“为天下敦厚道”的事迹和用心“备具于此”（《雪涛小说序》）。至万历四十年，他又重刻《雪涛阁四小书》和《雪涛小说》收入丛书《巨史钞》以行世，并视《四小书》为“安石碎金”，认为“进之之谈说，猥拾鄙俗咳唾馀沥，安於卑论浅见，村竖皆为解颐”，是“姑为玩世之言，如方朔诙谐乎金马门，坡仙放浪於西湖泉石之间，众人固且易而骇之矣”，故“人人喜为诵述”。（《四小书序》）而俞恩焯则称《四小书》乃“进之以宦游之余，为笔札之寄，遇风云则示恬憺，述符纪则进讽规，考著作则征闻见，杂诙谐则动废兴，而要以理之所钟情泄之，情之所积文通之，非仅仅齐谐稗官者比”。认为其将“千秋不磨”，“政以中多情至之语”。（《雪涛四小书叙》）且《雪涛阁四小书》和《雪涛小说》的部分内容在明末清初曾被选入《雪涛谐史》、《绿窗女史》、《皇明百家小说》、《说郭续》等书^①，传播较广。此外，清初黄宗羲编《明文授读》、《明文海》皆选录了江盈科的散文。但江盈科的诗，钱谦益编《列朝诗集》竟不选其诗，不提其人；王夫之撰《明诗评选》也不选江诗，却先在卷四称“以俗淫而坏公安之风矩者，雷何思、江进之数子而已”，又在卷八批评“江进之之粗粝”。朱彝尊编《明诗综》仅选江盈科七绝《读张魏公传有感曲壮愍事》一首，他虽赞此诗“露胆张目，洵诗家之南董也已”，但总体评价不高：“进之与袁中郎同官吴下，其诗颇近公安派，诗论亦以七子为非，特变而不成方者。中郎谓其矫枉之过，所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文人通病，大抵然矣。”

^①详见本书附录三《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

此后二百年间，除偶尔有人引述《雪涛诗评》的片言只语以外^①，江盈科竟近于销声匿迹，不仅文集无人翻刻，除地方文献外，连姓名、著作都极少有人提及。这固然与公安派在清代颇受冷遇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毕竟还有不少人把袁宏道作为批评的靶子，《袁中郎先生全集》在道光、同治年间还重刊过，而江盈科则完全失去了与袁宏道并称的资格，甚至长期湮没不为人知。直到二十世纪初陈田撰《明诗纪事》，才选录江盈科《书思》、《昆山舟中睡起》、《栈道》、《读张魏公传有感曲端》四首，另引袁宏道、朱彝尊评语三条，而陈田仅评曰：“进之才不及中郎，而近俚、近俳正复相似。今录其明畅之作。”前二句实是将钟惺和袁宏道的话去头掐尾拼合而成，后一句等于没说，因为雪涛诗歌几乎都明畅而不晦涩。我怀疑陈田根本就没有读过《雪涛阁集》，其所选四诗当是从他书中转录而来^②。

二十世纪以来，公安派先后两次受到知识界的重视乃至形成热潮，曾对现当代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产生过积极影响，但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是三袁兄弟，而对于江盈科的认识与研究则相对滞后。第一次热潮形成于1930年代，笔者曾撰《论公安派在现代

①实际上在康熙年间，仇占鳌撰《杜诗详注》中就已引用江盈科对杜甫诗歌的评语，朱彝尊编《明诗综》中已引述过江盈科对李梦阳、何景明、谢榛、宗臣等人的评价，其后如乾隆十五年编定的《御选唐宋诗醇》、乾隆二十四年王琦撰《李太白集注》等，也曾引用过江盈科的评语。

②按陈田所选江盈科四诗，《昆山舟中睡起》见于《雪涛阁集》卷三，且文字相同；又《读张魏公传有感曲端》，亦见于《雪涛阁集》卷五，但题作“张浚”，且文字有异；而《书思》、《栈道》二诗为晚年之作，见于地方文献中。笔者曾就各地方文献中所收江盈科作品加以比较，发现陈田所选四诗很可能都是以《沅湘耆旧集》卷二十一为依据，该书收录江盈科诗四十五首，这四首诗从题目到正文的文字完全一致。

文坛的多重回响》(《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一文,已就公安派在现代被发现乃至对于当时文坛和学界产生多重回响的过程和意义重新予以考察和阐释,认为周作人及其门生、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以鲁迅和阿英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这三大群体对公安派的解读与接受虽有差异,甚至引发过历时几年的论争,但对于现代新文学的发展和公安派的研究,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时关注的焦点是袁中郎,袁伯修和袁小修也相应受到了重视,而江盈科的登场却较为迟缓。早在二十年代末,周作人就开始研究公安派,但仅搜集和研究三袁兄弟的文集,因此,稍后他的《中国新文学源流》和在他的指导下由沈启无选编的《近代散文钞》,皆未将江盈科纳入视野。在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订的《袁中郎全集》由时代图书公司于1934年出版后,袁宗道的《白苏斋类集》二十二卷,袁中道《珂雪斋诗集》七卷《文集》十四卷、《珂雪斋近集》四卷、《袁小修日记》(即《游居柿录》)十三卷,也相继排印发行。但直到1936年,江盈科才有《雪涛小说》和《雪涛小书》(残本)排印出版^①。尤其是后书整理者章衣萍于1935年10月12日撰《雪涛小书前记》时还不知作者为谁,只是觉得“其评诗文、说笑话皆有精彩,思想行动,大概是袁中郎、冯梦龙一流人物”。稍后于12月4日撰《序二》,才从友人处获知作者为江进之。章氏所说的这位友人实即阿英,他从1933年开始,撰

^①按《雪涛小说》收入《世界文库》第九册,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是根据清初《说郭续》本排印,仅录14篇作品;又《雪涛小书》残本(仅存《诗评·闺秀诗评》、《谐史》)收入《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由中央书店出版。另外,1926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五朝小说大观·皇明百家小说》中,录有江盈科《雪涛谈丛》,共11篇作品,但当时尚无人重视公安派,更未把江盈科与公安派相联系。

写了《袁中郎做官》、《袁中郎与政治》、《袁中郎尺牍序》、《二修尺牍》、《江进之的笑话》、《雪涛小书》等一系列关于公安派的文章。其中《江进之的笑话》（《论语》第58期，1935-02-01）虽仅简略介绍五则笑话的内容，但已明确指出江盈科“是公安派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堪称一大发现。又其《雪涛小书》一文^①认为“四种之中，当以《诗评》为最佳”，“进之对于诗的理解，全般的从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并引述《用今》、《求真》等篇后说：“这都是说明进之在文学主张上完全属于公安体系的证据。”此外，该文还提及他在1934年就已向某藏书家借读《雪涛阁集》全书，并选抄一小册。这些选抄的作品，稍后收入他编校的《晚明小品文库》，于1936年7月由上海大江书店出版。该书共选录二十家小品，分为四辑，每辑五家，其中江盈科编入第一辑，录有江进之文41篇和袁中道撰《江进之传》。这是现代出版的多种晚明小品文选集中唯一将江盈科列为一家的选本，但包括阿英在内，整个现代学界没有发表一篇研究江盈科的正规论文。

公安派第二次受到重视始于1980年代，随后跨越世纪持续成为热潮，但有相当长一个时期仍以三袁为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仅有钱伯城整理的《袁宏道集笺校》（1981）、《白苏斋类集》（1989）、《珂雪斋集》（1989）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关，而江盈科还是只有一些笑话、寓言^②和他为袁宏道文集所作的四篇序言（见于《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为人所知。例如，任访秋《袁中郎

①从阿英所叙“襟霞阁将刊冰华生《雪涛小书》残本，惟不详冰华生姓氏”等语来看，其《雪涛小书》一文当作于1935年冬，但后来是以《明人笔记小话》之十，载于《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10月出版。

②参见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陈蒲清著《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初版，1996增订本）等。

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就只是把江盈科视为“附和中郎的作者”之一予以简介, 吴承学也因未读《雪涛阁集》而在《晚明小品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中视江盈科为“公安派的友声”。

实际上, 海峡两岸在1988年就已分别取得了扎扎实实研究江盈科的学术成果——林美秀的《江进之诗学理论与实践》(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研究所硕士论文, 1988-5) 和夏咸淳的《论公安派重要成员江盈科》(《文学研究丛刊》第5辑, 1988-12)。林文约八万字, 首次系统地阐释了江盈科诗学理论的构成与内涵, 并在全面考察《雪涛阁集》所录诗歌的基础上辨析体制与风格, 进而通过细致比验, 论证其创作实践与诗学理论皆能得其条贯。夏文约15000字, 从公安派重要成员的角度, 综合论述了江盈科的生平、思想(含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侧重于散文和寓言), 并且明确指出: “研究公安派如果仅仅限于三袁, 而不了解其他成员, 特别是像江盈科这样的重要作家, 那么这种研究就是不完全的, 缺乏全面概括的基础。”二文在某些方面可以互补, 本应由此推动江盈科的研究, 进而改变公安派研究的格局, 但由于林文并未正式发表, 而刊载夏文的《文学研究丛刊》也流布不广, 故皆少有人知, 影响甚微。

江盈科的整体形象真正为知识界所广泛知晓和接受, 是从1997年笔者辑校的《江盈科集》由岳麓书社出版以后开始的。该书不仅把《雪涛阁集》、《雪涛诗文辑佚》、《雪涛谈丛》、《谈言》、《雪涛诗评》、《闺秀诗评》、《谐史》、《皇明十六种小传》等首次合为一集梓行, 而且卷首破例收入笔者所撰长篇论文《江阔无澄浪林深有坠枝——论江盈科与公安派》以代“前言”, 系统论述了江盈科的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及其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 首次明

确提出：“在公安派的创立与发展时期，江盈科实际上是作为这个流派的副将而与主将袁宏道齐名，他的功绩与影响，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员之上。就其文学思想与诗文创作而言，大致与袁宏道倾向相近而又独具特色，的确可称为公安派的大家，从而可证当时文坛上以‘袁江二公’并称是名符其实的。”此外，卷首还有著名学者章培恒师和陈蒲清教授所赐二序，分别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江盈科的价值和意义。章序明确指出：“在公安派兴起以后，虽然‘三袁’并称，但严格说来，宗道是叨了弟弟宏道的光。至于袁中道，在袁宏道与江盈科在苏州张扬‘性灵’时，他在文坛上还是初露头角的新人。他之成为名家，是在公安派已进入后期之时，特别是袁宏道去世以后。所以，在公安派形成之初，与袁宏道一起打开局面，使寂然无人的‘空谷’成为‘轮蹄之所’的，乃是江盈科。钟惺在《与王稚恭兄弟》中以‘袁、江’并称，正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要深入研究公安派，绝不能只盯住袁宏道而撇掉江盈科。”陈序既肯定“公安派的创立，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完善，公安派创作领域的拓展，这三个方面都有江氏的独特贡献”，“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又指出“江氏有两点超过袁氏兄弟。第一，袁氏小品直抒性灵，个性突出，但涉及国计民生者较少；江氏诗文中则大多为关心国计民生之作，发论精警，具有大家风范。”“第二、袁氏虽推崇通俗文学，但无创作实践；江氏则力求理论与创作结合，在寓言和笑话创作上成绩突出。”这些精彩的见解，既是对于笔者整理《江盈科集》的奖掖和声援，也是对于学界同仁研究江盈科与公安派的引导。加之当年和稍后，笔者还发表了《江盈科生平著述考》（《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论公安派副将江盈科的文学思想》（《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3期）、《江盈科论》（《文学评论》1998年第2

期)、《论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及其地位》(《复旦学报》1998年第5期)等论文和《雪涛小说(外四种)》一书(其中一部分为新发现的材料,1998年底交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列入《明清小品丛刊》出版),进一步扩大了江盈科的知名度。因此,近十一年来,不仅江盈科受到了知识界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由此拓展了公安派研究的视野,并相继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果。其中既有一批研究公安派而兼及江盈科或专论江盈科的单篇论文(含学位论文,如首都师范大学2004届宋俊玲的博士学位论文《公安派研究》、苏州大学2007届姚丽丽的硕士学位论文《江盈科研究》等),也有周群《袁宏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孟祥荣《真趣与性灵——三袁与公安派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钟林斌《公安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熊礼汇《明清散文流派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徐艳《晚明小品文体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等专著,皆已把江盈科作为公安派的重要成员加以审视,尤其是章培恒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已将江盈科作为公安派的重要作家予以论述,明确指出“除袁宏道外,当时对扩大公安派影响起作用最大的首推江盈科”,并公正评价了江氏诗文的特点与功过。这是江盈科第一次作为公安派的代表作家被写入中国文学通史,且其篇幅略多于袁小修而远多于袁伯修,标志着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被湮没了几百年后终于得以恢复和确认。

最后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本书此次是应《湖湘文库》编委会之约而增订出版的,其内容实是将初版《江盈科集》和《雪涛小说(外四种)》二书合并而去其重复者,又增入新发现的雪涛诗文和有关江盈科生平著述的资料若干篇,但都依据原刻本并参照

《湖湘文库》的体例重新编校而成。兹就增订本内容、版本及校勘情况略述如下：

一、《雪涛阁集》十四卷，以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为底本，以清光绪《桃源县志》等地方文献参校，其中卷十四以明万历四十年潘之恒刻《亘史钞》本《雪涛小说》参校，并将潘之恒的评语和增补的作品附录于相应位置。

二、《雪涛诗文辑佚》二卷，在初刻本所辑基础上增入新发现的十五首，删去原据光绪《桃源县志》卷十四误收《憎蚊赋》一首（实为陈继儒作），合计一百六十首。另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光绪《桃源县志》卷十三录有署名江盈科作的《论文》一篇，前述林美秀《江进之诗学理论与实践》曾引以为据，实为误收元末明初苏伯衡之作，见于其《空同子誓说》，故初版《江盈科集》就未录入。

三、《雪涛阁四小书》，又名《雪涛小书》，以明万历四十年潘之恒刻《亘史钞》本为底本，并保留原有序言和潘之恒评语、附录等，但按江盈科自编顺序（即《谈丛》、《闻纪》、《谐史》、《诗评》）排列，且从清初刻本《说郭续》卷十六《雪涛谈丛》中补辑二篇、明末刻本《雪涛谐史》第二种《谈言》中补辑十篇，依次录入《谈丛》之末。前三书适当参校相关文献，《诗评》（含《闺秀诗评》）以清初刻本《说郭续》卷三十四《雪涛诗评》、《闺秀诗评》及相关文献参校，凡底本未收者，则据《说郭续》本补入。

四、《皇明十六种小传》四卷，以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为底本，无他本可校。又因底本卷三缺一页，导致《铁冠道人》篇无结尾，《周颠》篇无开头，今分别附录宋濂《张中传》、朱元璋《御制周颠仙人传》作为参考。

此外，为方便研究者，书末还附有一些参考资料：附录一为《生平资料》，附录二为《著述序跋》，附录三为《江盈科生平著述重考》，较初刻本皆有所增益。

在本书修订的过程中，曾得到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教授和杨光辉博士、台湾成功大学郑芳祥博士、《湖湘文库》编委会副主任夏剑钦编审以及本中心由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王魁星君的帮助，特此致谢！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 黄仁生

目 录

雪涛阁集

雪涛阁集序 袁宏道	3
雪涛阁集自叙	6

1

雪涛阁集卷之一

五言古风	7
高唐道中夜行	7
恩县道中	7
寿李碧山逸人	7
得谢九紫书却寄	8
晚出姑苏门	8
感怀	8
郭原性谒余旅邸出示佳制赋赠	9
真州饮酒戏咏	9
自述	10
送馆甥上官叔度还楚	10
阳山白龙庙	11
小孤山	11
吴伯母册	12